不能欠人一点点，没有被无条件爱过的人，

闫红

《小脚与西服》里写，张幼仪和徐志摩离婚很久后，有男人向她求婚，她的反应是：“我能帮他做什么呢？能不能帮他成功？”好像如果她不能做到的话，她就不配被爱。

从小就没有得到过无条件的爱的人，不能欠人一点点。接受别人的施与总会觉得何德何能，恨不得当场两清。想起张爱玲也是这样，虽然她自负天才，但日常中配得感并不高。看她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两段恋情，她都非常被动，第二段尤其是，动不动就说自己“残花败柳”，对于两个人的未来，不敢多问一句。

她也不能欠人钱。做她的债主，好的一方面是她一定会还你钱，坏的一方面是她还你之前，你的呼吸，她都觉得是在催债。

宋淇邝文美夫妇是张爱玲最亲密的朋友，友谊绵延四十余年，他们帮张爱玲接剧本谈合同看新作，往来书信几大本，张爱玲则将遗产留给了他们。

纵是这样的友谊，也曾差点翻了船。1962年元宵节前夜，身在香港的张爱玲写信给赖雅说：“他们（宋家）不再是我的朋友。”何以弄到这个地步，张爱玲之前的信里也有写：“宋家贷款是痛苦的安排，破坏了他们与我多年的交情。”

1955年，张爱玲去美国前跟电懋公司借了一笔钱，宋淇是保人。1960年2月8日，张爱玲写信给邝文美：

“收到你一月底的信，知道再耽搁下去会使你们误会我是不是不高兴写。其实我上封信里说的都是实话，欠公司的钱与欠私人的一样，怎么能惫赖。我后来再回想离港前的情形，已经完全记得清清楚楚，预支全部剧本费，本来为了救急，谁知窘状会拖到五年之久。目前虽然不等钱用，钱多点总心松一点。如果能再多欠一年，那我对公司非常感激，因为我仍旧迷信明年运气会好些。这是根据十三年前算的命。”（《张爱玲私语录》）

我没有查到邝文美1月底给张爱玲的信里写了什么，是不是传达出代公司向张爱玲催债的意思。张爱玲说“后来再回想……”“已经完全记得清清楚楚”，是不是一度记忆模糊？而她托邝文美向公司致意，请求再宽限一年，想来也是艰于启齿。

一年之后这笔钱并没还上，1961年2月21日，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说：“我这朋友极少的人，在我这方面是不拿你们只当朋友看待的。虽然因为欠着由你们经手的一笔钱，有点觉得亏心，我总认为是暂时的事。”——在她看来，爱一个人爱到跟他拿零花钱的程度，是非常严苛的检验。同样，若无其事地欠着朋友的钱，也是对这友谊的检验。信里她的意思似乎是宋氏夫妇在她眼里不是普通朋友，已经通过这检验，但她还是“有点觉得亏心”。

张爱玲生平最怕的，就是欠人钱。《小团圆》里，情人给女主一笔钱，明明白白地讲：“经济上我保护你好吗？”虽然数额不是“520”或者“1314”，但很显然，是不用还的生活费。

可她做不到不还，尤其在他失势之后，她总觉得他句句话都在暗示自己还钱。他明明骂同事“良心坏，写东西也会变坏的”，“九莉知道是说她一毛不拔”。

两者之间好像没有这么强的关联吧？

她对这笔债务太耿耿于怀了，不管什么事，她都能曲曲折折想到“还钱”上来。但她心如铁石地想：“吓不倒我。”

她铁了心不还钱，不是她贪婪，而是在她的债主排行榜上，情人名列第二，第一位是她妈。

当年九莉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投奔她妈，花了她妈不少钱，读书，看病，听上去都是当妈的义务，但她妈并不这么看。她妈是个界限感很强的人，人生计划里原本没有养育她这件事，九莉投奔过来是突发事件，母亲觉得女儿害自己破费了。

这个叙述有现实基础，张爱玲《私语》写：“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

九莉把金子还给母亲时，母亲哭了，当年抱怨归抱怨，并没有指望她还。但九莉轻松了，她不想做那个一直被审视被怀疑是不是“值得”的人。

情人的钱，后来当然也是还了。

但欠电懋的这笔钱有点难办，张爱玲原本寄希望于给电懋写《红楼梦》剧本挣点钱，但电懋担心邵氏抢拍《红楼梦》，拿到张爱玲写的剧本后迟迟没做决定。宋淇权力有限，夹在张爱玲和公司之间，有点难做人，他不是长袖善舞之人，表情就有点严肃，敏感的张爱玲解读为“每天都有生气的反应”，联系到那笔债务上去。

这种无言的对峙，一直延续到张爱玲离开香港时，不过张爱玲在香港的最后十来天是住在宋淇家的。张爱玲跟赖雅说：“他们不相信我的剧本，我不相信他们付费，拒绝多花钱住旅馆。一团糟，却为此生最不愉快五个月的适当结局。”

宋淇之子宋以朗回忆：“我需要让出睡房给她住，我住客厅喂蚊子。她给我的印象很简单，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子，深度近视却不戴眼镜，看东西需要俯前，喜欢吃隔夜面包。另外整天躲在房间写作，偶尔出来一起吃饭，与小孩无甚交流。”

就是互相躲着呗，另外，连人家小孩都不愿敷衍，这是真的不想好了。

这笔钱后来什么时候还上的不得而知，但张爱玲回到美国后，和宋家的友谊渐渐还是恢复了。应该是因为宋氏夫妇一如既往地赤诚待她，继续帮她接洽各种业务。

1962年底，宋淇离开电懋，张爱玲的同学翁美丽的丈夫正好也在电懋，张爱玲开始跟他合作，这件事让宋淇不太高兴，但待她之诚未有改变。1965年，宋淇热诚地将张爱玲推荐给出版商平鑫涛，解决了张爱玲后半生的经济问题。

1966年，张爱玲委托夏志清帮她谈电影版权，说：“这件事不能找宋淇，他为了从前我写剧本的事夹在中间受委屈。”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想明白的。

张爱玲处理人际关系，惯于决绝，对母亲，对弟弟，对炎樱，皆是如此。她小说里的人，像《半生缘》的世钧和曼桢，《多少恨》里的虞家茵，《金锁记》里的长安，也是稍有嫌隙就想着撤退。

她和宋氏夫妇的关系是难得的例外。因宋淇和邝文美无条件地对她好。张爱玲在他们这里，得到了在亲人和情人那里没有得到的爱和信任，让她放松下来。在处理这一段关系时，她变得有弹性了，可以承载不完美的那部分。那一番波折，宛如淬火，让他们彼此知道了对方的底线，从此莫逆于心。

谁说朋友间不能借钱？借钱，不但是考验，还是修行呢。

1985年，宋淇长期收不到张爱玲的信，有点着急，托在美国的水晶打听，为了说明情况，将他和张爱玲的通信附上。哪想水晶没去找张爱玲，而是写了一篇《张爱玲病了》，赫然引用了宋张两人通信原文。宋淇大为震惊，和邝文美各写了长信，百口莫辩地解释、道歉。

这次张爱玲回信了，说：“有一天在夕照街头走着，想到Stephen（宋淇）也说不定此刻已经不在人间了，非常震动悲哀。我说过每逢遇到才德风韵俱全的女人总立刻拿她跟Mae（邝文美）比，之后，更感叹世界上只有一个Mae。其实Stephen也一样独一无二，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与多方面的Renaissance man（文艺复兴时代的博雅之士）。”

她没有提水晶，但已经回答了宋氏夫妇的担忧，这回答就是宝玉说给黛玉听的那三个字：“你放心。”

人世无常，像你们这样的人再难觅，任何事和你们一比，都无足重轻了吧。

『文汇笔会』微信公众号

序跋精粹

读《王伯秋年谱长编》

沈飞德

早在两年前，沈罗亚女士特意电话我，说祖父年谱长编的编纂工作即将完成，希望我能为之作序。我深为王志雄夫妇毅然担当起王家长子长媳之责，完成一项无比艰辛却意义深远的工作而心生敬意，因而当即欣然答应了。癸卯岁末，我认真拜读了王志雄沈罗亚夫妇编纂的二十多万字的《王伯秋年谱长编》初稿，还有尚未编入书中的六万多字的《王伯秋文集》，得以重新全面认识并审视一个带有悲情色彩的民国“海归”。

1. 王伯秋（1884—1939）曾经是我很想探究的一个历史人物，源于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女婿。他1915年在留美期间与孙中山先生次女孙婉结婚后，生有女儿王纕蕙、儿子王弘之。我因在1990年代初关注孙中山家族研究，开始采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弘之先生，由此也结识了王老的夫人李云霞及长子长媳王志雄沈罗亚夫妇等家庭成员。在孙中山家族有关成员的采访中，我对王老的采访历时最长、次数最多，也是最深入的。有好几年，我成为王家的常客。虽然王老夫妇先后于2006年、2012年去世，但我与王家成员的联系从未中断。

我在撰写王老的传记时，详述其父母的婚恋故事，也写到其父王伯秋的生平事迹。王老向我谈了许多有关其父鲜为人知的轶闻，同时我还查阅了一些被人忽视的史料，深感王伯秋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历史人物。但事实是，他作为孙中山次女孙婉的第一任丈夫、孙中山先生的女婿的身分早已被后人遗忘，还有他作为名噪一时的文教界名流的史迹也湮没无闻。为此，我写了篇《被遗忘的孙中山女婿王伯秋》（《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6期）。由于仅根据王老的回忆和一些史料，主要是当年对有关史料和文献的查阅十分有限，故对王伯秋的了解和认识既不全面又很肤浅，文章所述很简略，还有些差错，只能算是一篇抛砖引玉之作。我后来写的《两次婚姻带来的悲欢离合——孙中山的女儿孙婉及其子女》一文，其中专立“王伯秋仕途沉浮”一节（该文收入拙著《民国第一家——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有幸的是，两年后我读到王老夫妇合作撰写的《沧桑——孙中山外孙王弘之家史纪实》一书，其中详细又生动地讲述了其父王伯秋和母亲孙婉的婚恋始末。前几年我又读到白谦慎教授的《王弘之老师》一文（《文汇报》“笔会”2017年11月24日），涉及王伯秋的家世、婚姻和经历。如今虽说在网络上可以轻易搜索到王伯秋的条目，但对他的生平和业绩的介绍仍旧极其简单，根本没有反映出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如前所述，有关王伯秋的史料和文献搜集的积累基础十分薄弱，学术研究成果更是近乎空白，在这种条件下要完成一本足以全面反映谱主生平和业绩的年谱长编，难度可想而知。何况两位编纂者已年逾花甲，学的是理科，从事的工作与文史研究毫不沾边。编纂年谱长编，关键在文献资料。两位作者的祖父离世已近八十年了，世事沧桑，史海茫茫，从哪里去寻觅祖父的史料、文献和行迹呢？但我从书中欣喜地看到了他俩勇于肩负家族文化传承的使命，八年里矢志不渝，同心协力，终于取得了令人惊喜的丰硕成果，完成了父辈为湖南湘乡大塘冲王氏家族修史的夙愿。

2. 这本年谱长编围绕谱主的家世、经历、婚姻、家庭、事业、交往、著述等方面作了全面、真实的呈现，特别是谱主1919年4月从美国学成回国到1939年5月在贵阳病逝的二十年内容，文献资料搜罗广泛，发掘深入，梳理用力。有三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是充分利用谱主之子王弘之夫妇的回忆录《沧桑》一书。口碑史料不仅弥补谱主有些时期文献资料缺乏的不足，又能提供其他史料和文献记载所不具有的历史细节。这本回忆录分上、中、下三部，上部是写王伯秋父亲王谨臣的“惨淡一生的将军”，中、下两部分别是“伯秋孙婉喜相逢”“王伯秋客逝贵阳”。

二是尽力从谱主社交圈人士的回忆、日记、书信等中搜寻相关资料，特别是胡适、陶行知、邵元冲、竺可桢、黄炎培、任鸿隽等知名人士的日记、书信，所获弥足珍贵。周作人回忆中最早记录王伯秋是在1903年。竺可桢在日记和书信中记下了王伯秋从福建前往重庆滞留贵阳的最后行迹。

三是依靠图书馆、档案馆，并借助互联网，查阅、梳理《申报》《时事新报》《益世报》《大公报》《求是报》和《国民政府公报》《福建省政府公报》等谱主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新闻报道、档案资料。《申报》是报道谱主最多，也是前后跨度最长的报纸。最早的报道是1912年12月16日，最后是1939年6月7日“王伯秋先生逝世报闻”。谱主留学日本、美国的档案资料也十分难得。

总而言之，这本年谱长编很好地反映了谱主一生重要的经历和业绩，从中可深切感受到他的抱负、思想、才识、个性、情感和追求等等，把一个长期被历史烟云遮没的民国海归知识分子的形象清晰地展现出来。

王伯秋，名金生，字纯焘，号伯秋，以号行世，1884年8月出生于晚清一个显赫的官宦之家。父亲王谨臣曾追随曾国藩办团练，是湘军的一员战将，最后官拜一品武职。伯秋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及长考入新式的杭州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留学，毕业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法系；后又于1913年远涉重洋，赴美深造，191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政法系。在美期间，他与孙中山次女孙婉缔结姻缘。他深受孙中山为振兴中华而创建中华民国的伟大理想的影响和激励，抱着科学救国的宏愿回国，很快成为活跃于南京、江苏乃至全国教育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的主要活动和事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致力于高等教育，同时涉及女子教育、幼儿教育，对平民教育的贡献尤其突出。他与陶行知等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兼任江苏省平民教育促进会会长，竭力推动平民教育。陶行知赞誉他为“南京平民教育的总司令”，在敬祝其母六十大寿时书赠“作十万新民、寿六旬王母”的贺联。他参与由胡适起草呼吁倡导“好人政府”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签字，成为与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王宠惠、梁漱溟等16人共同列名的提议人。

二是热心民间社团发展。他是中国科学社永久社员、理事会理事。早在留美时他就参加中国科学社，回国后他设法在南京落实了中国科学社新社所，并任社所委员，还负责筹备中国科学社第三届年会。他还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南京一队队长、南京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在南昌行营时，他主持筹备并成功举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成为该社成立以来规模和影响空前的一次年会。他参与筹建中华全国教育改进社、江苏省道路协会、中华道路协会南京分会，担任南京改良会会长、中华民国拒毒会南京拒毒分会董事、江苏省教职员联合会理事长……

三是倡导现代市政建设，是现代市政建设的先驱。他在中国科学社就以“科学与市政问题”为题作演讲，先后担任南京市政筹备会副主任、南京市政督办公署总办，南京、杭州市政厅参事，无锡市政筹备处参事。他在杭州市政厅厅长邵元冲就职典礼上应邀发表演讲，提出建设杭州“文化的艺术的市政”；对无锡的建设提出“速筹划开辟惠山植树造林，作为郊外公园案”，还与吴稚晖、荣德生等六人被聘为惠山风景委员会委员，在无锡县政府发表《我对于无锡建市之感想》的讲话。翻译发表国外学者的长篇论文《近代都市计划之意义及其方法》。他还为马饮冰编著的《都市政策论》一书作序，“述市政之源流，与进行之不易”。

四是涉足政坛，推进立法。他留日时就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留美归国后从关心时政到涉足政坛，以己专长推进民国立法。他先后担任江苏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淞沪特别市公约起草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土地问题研究委员会专门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襄试委员、国民政府高等考试襄试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他还是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劳工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立法工作，参与起草了户籍法、全国财政委员会组织大纲和条例、劳动法、自治法等。

五是主政长乐，造福一方。他因孙科干预失去立法院委员之职，之后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二处副处长，不久又入闽任福建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长乐县县长。他为建设新长乐竭力推行新政，市政建设与普及教育等多管齐下，一时政绩斐然。陶行知尤其深赞老友力推的“福建长乐之普教运动”。如今有其创办并题写刊名的《行政月刊》和撰写的《新长乐歌》《明郑和天妃灵应碑亭记》等存世。

3. 从家族史角度看，这本年谱长编的价值远不仅于王氏家族的文化传承，对于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家族也不失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重要史料。王伯秋作为孙婉的第一任丈夫，他的“孙中山女婿”身分，曾在长达八九十年的悠长岁月里，没有获得孙家人的公开认可，因而鲜为人知，以致其儿女王纕蕙、王弘之姐弟的身世也曾成为一个谜团。王弘之因父母回国后婚姻触礁，在襁褓中与母亲孙婉离别，之后再也没有见到母亲。2006年6月，王弘之在上海去世，悼词介绍他的身分，第一句就是“深切悼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外孙”。令王家后人悲喜交集的是，如今翠亨村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图片展览中，王伯秋的照片和名字已不再缺失了。

但在我看来，这本年谱长编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为中国近代人物史料文献库增添了一份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对研究民国的教育史、政治史、思想史、法制史、市政史、地方史、社团史、演讲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王伯秋自美留学回国后参与诸多重要历史事件，牵涉众多民国重要历史人物，书中提供的史料文献无疑有助于更好地深入了解、认识和研究那段历史。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其一，王伯秋与胡适的交往很早，也很深。胡适在日记中对王伯秋多有记载。他的《湖上》一诗，专为王伯秋而写，反映了他俩的特殊交往和情谊。王伯秋积极参与胡适发起倡导的“好人政府”，是胡适眼中的“好人”。在轰动一时的宣言签字发表之际，胡适创办的《努力》周报刊登了“王伯秋的来信”，此信也表达了王伯秋对改造中国政治的热切愿望。如将此信与他参与倡导“好人政府”的来龙去脉一并考察，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其二，王伯秋与张默君是湖南湘乡同乡，又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事，邵元冲因夫人张默君的关系与王伯秋结成莫逆之交，也是王伯秋涉足政坛的关键人物。《邵元冲日记》1925—1936年中有八十多处记述王伯秋。西安事变中邵元冲被击伤不治，王伯秋含悲写下了悼念他的祭文和挽诗，公开发表。

其三，有一封1920年9月5日陈独秀致胡适的信涉及王伯秋。此信不仅是研究陈独秀与胡适两人关系的重要史料，而且对分析陈独秀与李大钊之间的关系，乃至创建共产党都有重要价值，特别值得一提。全信为：

适之兄：

《新青年》已寄编辑诸君百本到守常兄处转交（他那里使用人多些，便于分送。），除我开单赠送的七十本外，尚余卅本，兄可与守常兄商量处置。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不会得全体赞成，即陶行知也有许多人反对，何况王伯秋！

弟 **独秀**。 九月五日

信中的“守常兄”为李大钊，“叔永”为任鸿隽。此信虽早已被学者引用，但存在问题有二：一是有学者将此信的时间误为1921年9月5日；二是在引用时有“断章取义”之嫌，竟将信末陈独秀特意在王伯秋姓名下画线的“何况王伯秋”一句删除，使得信的解读也就难以全面、准确了。从此信可知当时安徽教育厅厅长风波中，王伯秋也是厅长候选人之一，但陈独秀直言不看好他。陶行知与王伯秋交谊深厚，一向赞赏其才干，次年仍推荐其主持安徽教育厅，虽然还是没有成功，但已足见其时王伯秋在教育界的声望已非一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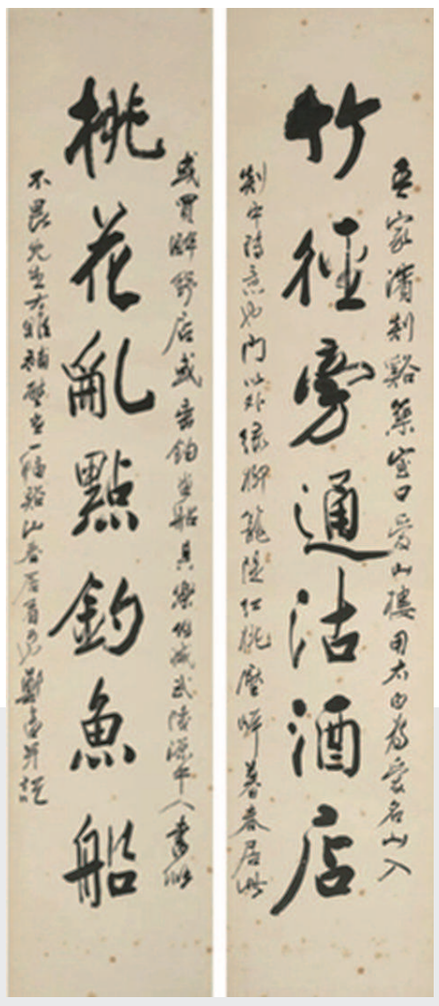
4. 掩卷沉思，我深深觉得，王伯秋为实现人生志向的事业选择是很值得研究的。他是一个融合新旧、中西的文化于一体的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带有悲情色彩的民国“海归”知识分子。他的悲情色彩既体现在他的婚姻家庭里，也体现在他的事业追求中。他的一生事业根植于教育，从投身教育，到参与政治，涉足政坛，又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竟辞官重新转向教育。然而，他最终落得“壮志未酬身先死”，埋骨异乡贵阳百花山。

纵观王伯秋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他坚守“以学问事业为前提”，“研究学问，努力事业”，是一部分民国“海归”知识分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大变动中的缩影，蕴含着比较典型的文化意义，因而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王伯秋虽然没有在国内参加并接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对其而言早已融入血脉，铸入灵魂。爱国成为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寻求不同途径救国图强的精神动力。由此观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王伯秋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艰难地选择的“始于教育，终于教育”的人生之路。

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向来深受史学界的重视。无论从政治制度史还是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五四运动后思想传播、政党兴起、政治转型、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等方面知识分子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这本年谱长编无疑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5. 当然，这本年谱长编也存在这类书编纂中较难避免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因史料文献的缺失，造成一些史事的空白或语焉不详。譬如谱主青少年和留学日本、美国时期的资料明显匮乏，较多依靠王弘之夫妇的回忆录《沧桑》来弥补，但回忆录常存在时间上的差错和史实上欠准确等问题。另外，对谱主有些重要史实的交代尚不清楚，如他参加同盟会的时间，与孙中山、孙科父子以及黄兴等同盟会骨干人员的关系，与孙婉相识和婚恋的过程，辞职离闽赴贵阳的详情。条目的编排前后偶有重复，还有些是属于编纂体例方面的问题，相信经过出版社编辑之手，定可妥善处理。瑕不掩瑜，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不影响它出版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甲辰正月写于黄浦江畔“三分楼”，修改于谷雨后



左：“竹径桃花”联；右：水云词意，均选自海派艺术馆“造炬成昶——纪念郑午昌诞辰130周年特展”